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之后
又一海外华人学者明史力作
探究中国历史的嬗变之大道

本书荣获2001年亚太地区桐山奖

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

永乐大帝

蔡石山
江政宽
译著



永乐大帝

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乐大帝 / 蔡石山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11

ISBN 978 - 7 - 101 - 06977 - 8

I. 永… II. 蔡… III. 明成祖(1360~1424)—传记

IV. 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8850 号

书 名 永乐大帝

著 者 蔡石山

责任编辑 徐卫东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¼ 插页 6 字数 23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977 - 8

定 价 28.00 元

谢 辞

我很感激 Hoyt Purvis、学生安田隆，以及我的弟弟文庆，协助我搜集史料。明史同行学者已对历史的种种方面作了详尽研究，而我有参酌其作品的有利条件；尤其，Edward L. Dreyer 和朱鸿对明代早期政治的讨论、Edward L. Farmer 对明代早期立法的讨论、商传对永乐童年轶事的讨论，以及寺田隆信对永乐战役图的讨论，我想表示我的感谢。我的儿子九峰照旧是我的第一位编辑和批评家；他修饰我的文字、厘清我的想法，并且给予我大力的支持。我要感谢 Beverly Butcher，在炎热的夏天，花了五个星期阅读全部的原稿，并且给了我一些极宝贵的建议。我也要感谢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 Michael Duckworth 和 Lorri Hagman；前者找了两位非常有能力又体贴的审稿人，帮助我改进我的原稿，而后者则辛勤地作了编审。

本计划进行的期间，亚洲、美洲和欧洲的同僚和友人，提供了灵感、鼓励和协助，他/她们包括了张存武、陈三井、赵绮娜、熊秉真（皆任职于台湾的中研院）、Tom C. Kennedy、Bill F. Tucker、郑永常、谭天星、Paul Holbo、Dan Ferritor、Carl Jacobson、Robert G. Finlay、Doug Merwin、Shaun Tougher，以及 Harry Lamley。钟英昌教我怎样使用中文软件，徐华校对了拼音音译，还有 Kimberly M. Chenault 印出几个不同稿次的原稿，使我受惠良多。我的数十位学生，注册参加夏季旅游，跟我一起研究“长江”（1986）、“丝路”（1988）、“蒙古与满洲”（1995），以及“西藏与尼泊尔”（1999），我也想要表示我欠他/她们人情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女儿蔡雪枫医师，在撰写本书期间经常关照我的健康。

我也要感谢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允许我使用几张明代收藏品的相片。本研究的进行，得到阿肯色大学富尔布莱特文理学院专门研究案的帮助，以及华顿家族慈善基金会的研究经费。

前 言

不屈不挠的永乐，一直被看作是帝制中国最好的君主，因为他是一位不知疲倦又不知歇息的君主。在近代早期的时代，他不仅为十五世纪的中国，也为大半的亚洲，设定了政治议题。同时，他也一直被批评为帝制中国最坏的君主，因为他残害时任皇帝的侄子，犯了叛逆罪；也因为二十余年的时间，他让大多数的臣民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他是帝国专制的化身。本质上，他很可能是个倔强易怒的人，能够轻易地丢弃多愁善感和忠诚，赞同残忍和野蛮行为。或者说，也许因为他不是双亲的长子——永乐是王朝创建者二十六个儿子中的老四——他挑战权威和当权派，可说是命运注定的，而且也是环境造就的。尽管他不是受宠爱的孩子，不过，他的表现说明他是坚强的、聪明的，而且还相当能干。他有很深的自知之明和十分敏感的性格；即使最轻微的冒犯，也会引起冷落和愤怒的强烈情感。在令人敬畏的父亲死后，永乐精力充沛地担任他兄弟和侄子的指挥，显露出干练和主人派头。他的统治在1424年结束之际，他不仅是王朝创建者的儿子，而且也是近代中国基本特征的创始人。

这些突出的特点，以及分成两支的历史人格，使得永乐这位相当令人动心的中国君主，适合当传主。重要的传记问题，既涉及人的狡诈，亦涉及历史的狡诈。“谋反”和“篡位”之类充满政治情绪的事情，在永乐三十九岁时考验着他，而他真的准备好如何应付了吗？他是个愤世嫉俗的操弄者，还是因为被迫处理大规模的种种危机，才造就了他的伟大呢？没有这些危机，他还会跟不敢冒险又一事无成的那些人联合在一起吗？他如何让他那种绝对主义，符合传统中国的政治哲学呢？更重要的是，永乐成功地转化了无数臣民的生活和梦想，且最终转化了大明的政府特性和社会特性吗？

就像很多专横的统治者那样，意志上的奋斗使其心理健康付出了代价。

永乐不是不愿与人来往的人，而是一个备受折磨的人，一个有严重、复发之沮丧的受害者。他经常抱怨剧烈头痛和失眠，他的腹部阵痛，这些都是深沉压抑之焦虑的症状。不过，他必须付出的最高代价，乃是他无法阻止在历史上被记载成所谓的谋害者和篡位者；尽管他的一生有很多成就，但他侄子建文（1377—1402）的鬼魂，还是继续萦绕在他的脑际。然而，在赢得1399年至1402年血腥又毁灭性的靖难内战之后，他当然更加严格地自我鞭策。他精力旺盛又富冒险精神的领导能力，用来自上层的酵素，活化了这个成功又自满的国家，也开创了一个无可挑剔之繁荣、军事扩张，以及非凡外交的光辉灿烂时代。在他统治的这二十三年（1402—1424）间，中国变得外向，享有遍布整个亚洲世界的最高威望。永乐竭尽所能地填补受战争蹂躏之国度里的政治鸿沟，为后世打造了一个“圣君”的形象时，境内升平，经济繁荣。他采用的许多政策，以及袭自他父亲或自己创设的一些政府部门，包括了一段重要的形成时期，而新重组的帝制中国在这段时期获得了巩固。所以，导致中国政治绝对主义的因素之一，在于永乐的父亲和他自己的统治期间造成的制度性发展。他的父亲是明代绝对主义的胚胎，而永乐才是起源。

永乐这位有很强个性的奇伟男子，是一位非凡的、不辞辛劳的专制君主，也是一位苛求的皇帝；他是积极政府之理念的化身。他极度嗜好操纵事情，而且通过他旺盛精力的表现，我们认识到他的政治动物本能。他也有一种本事，以他自己的无畏，对他人的恐惧保持镇静。对永乐来说，生命就是冒险和战斗，经常要冲破重重的困难。我们从他身上了解到一位权力、阴谋、怨恨和无赖行径的操弄高手之秘密。因此，本书与一位近代早期中国专制君主的激情、偏见、沮丧和愿景有关。它是关于一位伟大又能干之君主的斗争和拯救的故事，也试图了解其出身、教育和传统，在塑造中国史上最伟大人物之一的人格、价值观和道德感时的角色。它还涉及一个人冷酷地寻求对蒙古、满洲和越南扩张，而且也在东南亚、印度洋，以及亚洲世界的其他地方，不断地追求威望。永乐的意识形态乃是追寻，也由于追寻，他开辟了一种新式的帝国政治。通过本研究，我希望阐述明代早期的特点与事件之间的缠结，描绘中华帝国当局的模式，以及明代绝对主义的演化性质。

谢 辞	1
前 言	1
第一章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1423 年 2 月 23 日	1
第二章 成长的岁月/1360—1382	17
第三章 等待的岁月/1382—1398	33
第四章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1398—1402	51
第五章 重建的岁月:政府与政治/1402—1420	71
第六章 中兴的岁月:社会和经济/1402—1421	95

第一章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 /1423 年 2 月 23 日

一夜，罗马皇帝提图斯(Titus, 39—81)与他的几位挚友一起进餐时，他意识到，他整天没有为任何人做善举。就在那时，他说出了他的不朽隽语，“朋友，我又少了一天了啊！”明朝的永乐皇帝，驾崩于 1424 年 8 月 12 日，自从 1402 年 7 月 17 日登极以来——近乎八千零六十二天的在位期间——而且所有的证据也显示，他从未浪费过一天。人类始终以“日”为生活的基础：尼安德塔人或北京人不会理解“月”或“年”，但毋庸置疑地，他或她会了解，日子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或她会知道，在那段短暂、充满危险的时间里，人必须为了生活而奋斗。的确，日子是生活本身的一种缩影，而每天在时间中的逗留，仅仅是更大旅程的一种倒影。叔本华(Schopenhauer)说，“每一天都是一个人生的缩影”。至少，为了小规模地一瞥永乐日常生活的形式和内容，让我们伴随着永乐皇帝，走过宫廷生活的一天。这天是农历正月十三日(乙未日)，西历 1423 年 2 月 23 日。中国一片欢闹、有自信，没什么好忧虑的，欢天喜地正要过元宵节，而经济也以全速进展。

1423 年，在这个寒冷冬日的前夕，一组五人的更鼓房太监，轮流爬上了北京的玄武门——把宫殿建筑群跟紫禁城北端之煤山隔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地方——打着夜鼓(明代中国人将一夜分为五更，而一更又分为若干点。一更揭开了夜幕，三更表示子夜，而五更则示意破晓)。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十余位太监在文华殿后方的刻漏房工作。水从一小孔流入一个容器，漏箭在水上的刻度指示着时间(八刻度一小时)。每一小时结束时，直殿监太监便将“时辰牌”带到永乐皇帝过夜的乾清宫，换成一个新的^①。“时辰牌”大约三十

^① 尽管稍早的几天前，乾清宫毁于大火，不过，永乐的日常事务始于他在主要寝宫起床的时刻。

公分长，青地金字。任何看到它的人必须侧立让路，而坐着的人必须起身，表示他们对时辰牌信差的敬意。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六十三岁的永乐听到四更鼓声时便起床。

当永乐开始沐浴更衣时，灯笼和提灯迅速照亮了整个乾清宫。奉御净人已经带了器皿来清理永乐皇帝的小便和痰液。他们手上有内官监制造的薄软厕纸，也提来了几桶从附近宫井汲取的井水。他们仔细检查了澡盆，以及所有混堂司提供的洗洁液、毛巾和其他的洗浴设备。在洗完一个温抚的澡后，永乐穿着一双紫白相间的便鞋，坐在一张有垫褥的椅子上；一位奉御净人弄干、梳理着他的头发，而另一位则修剪他好看的髭须和长长的胡须。永乐皇帝沉思默想了片刻，这一天他要完成什么事。这天是个典型的北京冬天早晨——严寒、多风又潮湿——但他的房间有惜薪司提供的燃料木炭和薪柴，相当暖和。永乐想起明天——正月十四日——惜薪司太监会来拖运垃圾和大粪，也会清理手推车、木炭堆，以及紫禁城的每处垃圾场。永乐皇帝随后喝了点茶，吃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监督下的厨师所准备的早斋。过去三天，永乐皇帝不饮酒、不茹荤，因为他这一天需要向上天报告帝国的状况；也因为这一天，是明朝十三个最重要的国家祭祀之一，永乐不问疾，不吊丧，不听乐，不理刑名。而在这三天斋戒期间，他也要避免临幸任何的妃嫔^①。

早餐之后，奉御净人协助永乐皇帝着上他的服饰、头饰、围巾、龙袍，还有尚衣监特别裁制的鞋子。他准备要离开主要寝宫的时候，刻漏房太监听到九刻水的第一声时，便迅速走到宫门去通报拂晓的来临。当他们听到九刻水的第二声时，立即禀报永乐皇帝的御前^②。整个紫禁城突然间充满了生气。着红蟒衣的司礼掌印太监（正四品），在司礼秉笔太监（从四品）伴随下，到达了乾清宫。即将下班的司礼秉笔太监，把一个大约三公分长的象牙小牌，交接给下一位秉笔。除了永乐皇帝的锦衣卫之外，掌宝玺的官员也来了，他们带来各种功能的宝玺。因为永乐今天安排要祭天，他们带了最神圣的宝玺，也

① 张廷玉等编，《明史》，卷47，志23，页1239。

② 刘若愚，《酌中志》，页147、151、195。

就是明朝继承自唐宋朝的皇帝奉天之宝^①。

黎明前的几分钟，御前侍从已经跨过了“龙道”，跨过这条将紫禁城工作区跟生活区分隔的不成文分界。慢慢朝南走过一个大庭院之后，永乐沿着华盖殿和奉天殿，趋近1421年春天曾因祝融而受损的谨身殿。永乐偶尔一瞥几个青铜香炉，把手伸进了两个镀金大铜锅的其中一个，确定一下容器里面救火用的水有没有冻结。当他到达华盖殿时，他要求歇一会儿，以便脱掉袍服里的羊毛背心。他通常在华盖殿举行早朝，不过，南郊的国家祭祀即将来临，于是便在奉天门（后来重新命名为皇极门）举行小型的早朝。永乐皇帝重新整好衣装后，十二位人高马大、身强体健的都知监太监，即引领他进入一顶黄色的皇轿。

接着永乐坐上轿子，往南到奉天殿，该殿有离地的三段台阶，是最高的皇宫建筑。殿内，独一无二的帝王庄严端坐，与令人敬畏的雕龙屏风相配。才在两个星期前，永乐就是在奉天殿办除夕晚宴的，宴请诸位藩王、公爵、侯爵和伯爵。根据传统，永乐皇帝要到这一殿来带领国家过农历新年与冬至。他发出诏令，召见科举考试的杰出举子，以及任命领导讨伐的指挥官，也都是在这个殿。然而，这个早上，永乐不会踏入奉天殿；相反地，他的轿子直行到宏伟的奉天门，该宫门由巨大的红色圆柱支撑着，两只看起来很凶猛的青铜狮子在门侧踞守。三段的台阶通向三个雕饰过的大理石露台，永乐皇帝在那里看到文职官员（从四品以上）排成一线，站在门的东侧，而高阶的武职官员则站在西侧。与此同时，掌宝玺的官员将各种宝玺放在桌上，一动也不动地紧靠在桌旁。五更鼓的声音减弱到听不见时，一名着红色蟒袍的太监就开始所谓的“鸣鞭”。永乐开始早朝时，这栋巨大建筑物的四周，寂静无声。端坐的永乐皇帝，单独面朝南方，他听到数以百计的声音，同时呼喊“吾皇万岁！”伴随欢呼而来的是依仪式而行的叩头，而乐队则奏起宫乐的组曲。因为今天是一个吉日，祭天的日子，一位司礼官员大声宣布，朝会提早结束。那些有急事要禀报的人，被提醒说午朝时再报。当永乐起身示意随从要继续往南移动

^① 《明史》，卷74，志50，页1803。

时，司礼太监便再度“鸣鞭”^①。永乐的轿子往下移到中间的台阶，而文职官员和武职人员则各自找路下左右的台阶。

在穿过一座国家典礼期间能够容纳几千人的广大庭院之后，御前侍从走过架在著名金水河上的一座有大理石栏杆的桥（总共有五座桥，但中间这座桥只有永乐皇帝才能使用）。永乐现在进入了五凤楼围绕的巨大午门。永乐在午门前面的广场，廷杖冒犯他的官员，而在午门的城楼上，校阅军队和观看游街示众的战俘。永乐走进午门的其中一间休息房，脱掉他的晨袍，穿上一套特别为祭祀典礼裁制的绚丽服装。在离开午门之前，他询问太监管理的司设监和巾帽局，是否备妥祭祀仪式所需的所有装备，比如说服装、帐篷、褥垫、顶篷、桌子和桌巾、帆布，以及旗帜。太常寺卿与神宫监掌印太监亦向他报告说，盛典用的各种仪式食物和酒类已安排妥当。

永乐在午门外坐上了龙车，而御前侍从直直往南走，就像织布机那般往来穿梭。永乐皇帝沿途会看到太庙在他的左方，社稷坛在他的右方。他非常熟悉这些神圣的地方，因为每逢农历正月、四月、七月和十月的初一，他必须到那里去作国家祭祀。然而，一年前，因为农历新年有日蚀，他不得不取消所有的朝会，而将祭祀典礼改为正月初五^②。随后，永乐的龙车通过端门与巨大的石制承天门（后来重新命名为天安门）。永乐的诏令总是在承天门上首度大声宣读，然后放进一个云匣，用彩绳绑在龙竿上。看到云匣由承天门上降下，看到礼部官员在取下诏令以颁行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之前，对它又舞蹈又四拜，此一景象始终是个奇观^③。

跨过承天门下的五座白玉石桥之后，永乐与侍从进入了被称为天街（其在1651年扩建，1958年又再度扩建而成今日的天安门广场）的T字形庭院。天街两侧，是十又二分之一米高的城墙，而城墙由每一个角落的塔楼隔开。两座大门，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矗立在天街的尾端，日夜有重兵镇守。永乐的官员每天穿过这些门，到紫禁城令人敬畏的诸殿。每逢殿试之后，永乐会

① 《明史》，卷53，志29，页1351—1352。

② 同上，卷7，本纪7，页101。有关宫殿配置的描述，依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6—8。

③ 同上，卷56，志32，页1415；亦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页214。

选拔出前三名的进士,依照传统,他们很快会被引领至长安左门,带到顺天府府署,府尹会以盛宴为他们增添光辉。礼部尚书在一两天内,会为所有的新科进士准备一场宴会^①。矗立在长安左门南边,有若干建筑物的街区,是永乐的六部、鸿胪寺、钦天监和太医院。正对着这些建筑物的,则是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和锦衣卫。当永乐走过这些建筑物的时候,典乐官演奏起了许多的列队行进乐曲,直到他到达大明门,而该门只有像今天这样的盛典才会开放。在御前侍从驱车过了正阳门之后,现在永乐可以看到大祀殿在他的左方一点六公里处闪耀着。

永乐皇帝的龙车在石头路面上,从正阳门一路前往梯形的天坛(后来重建为天坛建筑群)时,他充分体会到,三年前,也就是1420年,他的建筑师和工匠应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在这个地点建造了一座建筑杰作,还有几个月前为今年的大事所做的准备。沿着这条路,观众竖立了观看棚,以便一瞥永乐皇帝。在最上方的露台上,永乐注意到若干代表风、云、雷、雨、山川诸神的牌位。他也看见陈列在这些神像旁边的其他仪式器材。以象征财富和权力之玉石和青铜所制造的仪式容器,里头盛装食物和酒,炫耀性地献祭给这些雕像所代表的诸神。当永乐站在天坛发光的中心,吸着点燃的香所散发的愉悦香气时,有着复杂图案的巨大灯笼,光线照射天际,而乐队和男性歌者与舞者,在天坛上和天坛前表演着^②。天坛四周,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皇室族人(包括皇储)、文武百官、太监与平民,所有人都找寻着天象,希望从诸神那里收到他们自己的特殊祝福。在号角、鼓和二十三种其他的乐器组成的庄严韵律声中,献礼开始了。尽管流程极度复杂,不过,永乐却驾轻就熟,就像其他的日常工作那样。虽然如此,典礼接近尾声时,他也开始觉得疲倦,无法控制地咳嗽了一阵子。然而,他很高兴听到他的父亲亲自为这类国家祭祀所谱曲的九

① 罗仑,《明代的乡试、会试与殿试》,页81。

② 《明太宗实录》,卷274,页4a,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亦参见 Joseph S. C. Lam, "Transn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Music: State Sacrificial Music from Southern Song China (A. D. 1127—1279)," *The World of Music* 38, no. 2 (1996), p. 77.

首歌^①。

这场固定又漫长的祭祀仪式，使永乐疲惫不堪。等他回到紫禁城的时候，早就过了十点。他觉得疲倦，脸色有点苍白，因为1386年（那时他二十六岁）时的一种神秘疾病之效应从未离开过他。他苦于恶心、头痛，以及偶发的癫痫发作。没有人真正知道那是什么疾病，但每位官员都惧怕永乐突然的龙怒。后世学者做的假设是砒霜中毒，亦即一种神经性疾病，乃至于是精神性疾病（永乐的确是暴躁、反复无常又古怪的）。后来，他的人生苦于风湿症和其他疾病。他这些年来，努力定期服用太监司药人员制作的药丸，来维系他的健康。他们受过各方面医学知识的训练，培育和采集着各种动植物药材。他们一年四季把处方材料研磨成粉末，而且使用蜂蜜作为黏合物来制作药丸。他们将永乐每天的药丸，保存在他主要的寝宫，但把其他常用的药草和药物，储存在文华殿的附属建筑御药房。不论永乐皇帝何时何地，想要服用预防性或滋养性的药丸，他的奉御净人总是能即时取得^②。

从国家祭祀返回之后，永乐在文华殿下了轿子，马上走进御药房。两名穿着吉服的御医，几乎立即赶到永乐皇帝的房间。在向皇上叩头之前，他们先在那里焚香。叩头毕，一名御医跪诊永乐的左手，另一名跪诊他的右手，依循的是中国传统的“望、闻、问、切”方法。诊毕，相互换边，在相互磋商之前，会问皇上几个问题，再诊一下脉。他们一起开了一帖兼有动、植、矿物的药方，包括舒缓神经紧张的辰砂与琥珀、改善血液循环的桃核与红花、减少盗汗的麻黄，以及强化心脏功能的高丽参鹿鞭。永乐的司药人员走到受严密看守的药房，从一排叠着一排、排列整齐的抽屉里抓出材料，依处方供药^③。在配好所有处方材料之后，两名司药人员把药材放进一个大药壶，加水熬煮。当草药煎好时，他们倒进两个碗等它凉。一位御医和一位太监，先一起喝了一碗，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永乐喝下另一碗^④。当永乐皇帝开始觉得

① 更多有关音乐和仪式的讨论，参见《明史》，卷47，志23，页1227—1233；卷48，志24，页1246—1247。亦参见Lam, *State Sacrifices and Music in Ming China*。

② 王崇武，《明成祖与方士》，页16—18。

③ 吕遂，《明宫史》，页43—44。此一特别的处方是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

④ 《明史》，卷74，志50，页1812。

比较好的时候，他示意御医和司药人员离房，让他能小睡片刻。

短暂的午休提振了年迈皇帝的精神，他直接走到御酒房用午餐。毗连武英殿的这栋建筑御酒房，为永乐皇帝准备了上好的酒和饮料、享有盛名的白面、最美味的干食品（诸如肉、咸鱼和水果），以及生的腌菜和豆腐^①。时间正好正午，精神恢复的永乐急切地想在右顺门举行午朝，这位躬亲实践的皇帝藉由这一例行公事，来维护他对这个大帝国的控制权。就在午朝之后，永乐要求吏部报告新的任命、委任职位、晋升和降级。但永乐皇帝觉得有点不顺畅，因为在四个月前的一次突然的龙怒中，他将久任吏部尚书的蹇义（1363—1435）下了狱。在这个特别的下午，文选司郎中和稽勋司郎中报告说，有略微超过一千五百位京城官员、六百位额外配置南京留都的官员，以及部署在各省大约两万两千位的官员^②。永乐批准了验封司和考功司郎中提交的晋升和奖励的建议名单。

他随后把注意力转到户部，而久任其尚书的夏原吉（1366—1430）亦在狱中服刑。1417年，夏原吉太过关切帝国的财政状况，以至于他大声反对永乐提议的战役。当时的尚书是郭资，他也面对这一不值得羡慕的工作：征收税粮，且将其运送给永乐全帝国的军队。郭资报告说，他还是用近乎九百九十七万户和五千两百万人的旧人口数字来确定税额。然而，他不会把估计有六百万的安南（北越）人算进这一年的统计数，因此税粮总计会稍稍多于三千两百万^③。郭资也说，户部和兵部一直密切配合，将粮盐运送到各军事驻地。永乐提醒郭资说，去年的大雨和洪水，对南京和北京一带，以及山东和河南境内的农田，造成严重的损害，他要免除他们半年的粮税。郭资承认，灾区的粮食岁入，有大约六十一万石的差额，但解释说，将由中部和南部省份丰收的农作物来抵消。永乐似乎也很高兴听到，他去年派遣去视察全帝国之国家库房和粮仓，共计八十名的钦差——官员与太监——已经返回，且对国家的粮食

① 吕毖，《明宫史》，页14、29、44。

② 一千五百位京官的数字，是根据1409年的记载。有关明朝官员人数的更多讨论，参见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pp. 11—12.

③ 一石相当于六十点四五三公斤。

供应和储备,有普遍乐观的描述^①。

接下来,礼部尚书报告有关不同朝贡国使节的接待。永乐尤其有兴趣的是,伴随正使总兵郑和(1371—1433)第六次下西洋回来的十二位非洲和阿拉伯使节。由于礼部尚书吕震(1365—1426)亦下狱,永乐要求代理尚书金纯,要更仔细地审阅全国所有佛僧和道士的考试和度牒。皇上随后询问有关这一年午门之外元宵节的准备状况,这是有赖跟钟鼓司密切合作的一项任务。在礼部报告完之后,永乐宣布,今天不举行晚朝,还有这一年的国定假日将从元宵节开始,今后两天(明代的国定假日通常始于农历正月十一日,结束于十二日)。从农历正月十五日到二十五日,不举行朝会,也没有夜间巡查。然而,如果有紧急状况,负责的官员应以书面报告,且通过通政司发送。

永乐接下来问兵部尚书赵玘,西南省份广西的柳州土著居民动乱是否具有政治含义。赵玘说,尽管社会动乱的声势变大,但少数人的激进行动,看来好像是放出多余蒸汽的一种可控制的排气口。永乐接受了这一看法,不过,因为其毗连的安南先前的暴动曾带给永乐困扰,柳州的动乱则更加让他担心。因此,他敕令军队镇压土著居民的捣乱者。永乐的总兵官丰城侯李彬,前一年病故于交趾。因此,他问兵部尚书,安南造反者黎利的活动是否会得到足够的大众吸引力,而转变成反抗大明的战乱。赵玘回答说,其他的安南王位觊觎者都敕平了,黎利如今是唯一的造反者,而且他最近在车来县(在安南宁化州)被新的中国总兵官陈智打败,后被逐归魂县。兵部尚书转达了黎利的求降协定。皇上点了头,但并未立即允许。相反地,他询问兵部尚书有关驻地制度的状况,太仆寺监督下牧马场的数量,以及车驾司与武库司是否发展了任何新武器或建造任何船只。

轮到刑部报告的时候,永乐又觉得不顺畅,因为刑部依然群龙无首,久任其位的尚书吴中(1372—1442)亦入狱。即使在晚年,永乐的果断——还有对犹豫不决之人的不耐烦,仍旧是有名的“剃刀”。至少,他向来都怪罪朝廷里的每一位大臣。在司法问题上,永乐转到御史台的左、右都御史刘观与王彰身上,告诉他们要再审所有严厉和长刑期的判决,纠正那些不当的。他尤其

^①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页568。

要御史了解一下,是否较重的判决可以减轻,法庭的审查结果和程序是否有不适当的做法,或者,是否有存疑的裁决或没有可靠根据的指控。永乐随后问道,政府里面是否有人不义地将无辜之人下狱,或者,对他的臣民做了不道德的事。王彰与刘观指出,因为北京和南京的国家监狱,没准备好管理和监禁服刑的罪犯,也因为光是供应食物和照顾狭窄空间的囚犯对政府来说便是一种负担,他们正在为几十名犯人请求假释和长假。随后,他们说道,他们把所有有关死囚的指控、裁决,以及审判暨判决纪录,移送到大理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永乐此时还不会把他的吏部、礼部或刑部尚书释放出狱)^①。

最后一位向皇上禀告的尚书是工部尚书李庆,他在一年前,指挥大约二十三万五千名搬运工人,为永乐的军事行动运送粮食。作为工部尚书兼领兵部事,李庆的主要职责,是为水路和道路维护之类的定期国家计划征募工匠和壮丁。虽然如此,永乐问了他有关军器局和宝源局的状况。由于宫殿建筑群、藩王府邸,以及天寿山和其他地方之皇陵的建造,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永乐提醒工部尚书要跟内官监密切合作;从永乐朝廷里人员和办公室空间的角度观之,内官监是所有太监机构中最大的。工部尚书凭直觉了解,如果他不能提供足够的建材——诸如木材、石材、砖块、鹰架、油漆、铜、锡、青铜和铁——那么他不仅会跟内官监掌印太监争吵,而且永乐肯定会让他倒大霉^②。

最后,轮到五军都督府报告军队用兵上的方向,以及专业的军事管理事宜,而永乐皇帝对这些主题是相当精通的。不过,永乐还是要求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以及都督僉事(正二品)必须频繁作简报。再者,因为1411年以来,他指派战术高明的太监当都尉,现在他又多任命了几位镇守太监,驻守在北方的边境。永乐亦指示兵仗局掌印太监,要监督京城兵工厂新火器的制造。兵仗局于此际向他保证,他们继续制造诸如钥匙、铁锁、铁锤、乞巧小针、螺丝起子和剪刀之类的品目。永乐知道,他把太监指挥

① 1423年3月,蹇义被释放,复职为吏部尚书;一个月后,礼部尚书吕震亦被释放。不过,户部尚书夏原吉与刑部尚书吴中,直到永乐驾崩之后才被释放和复职。

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永乐的几位继承人变得懒惰又挥霍无度。明朝第十三位皇帝万历(1573年至1620年在位),对政事漠不关心,超过二十年不上朝。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官编入正式的军事机构，让他们充当起君主的爪牙，也由此延伸为国家的爪牙。从现在开始，他们会不断地跟专业的指挥官密切往来，为他新型的绝对主义提供保险^①。

几乎是下午两点了，但永乐注意到，少数官员还没有说话。在他示意午朝休会之前，司礼监官员宣告，任何要皇上过目的其他事情应该向通政司汇报。一大清早，超过四百份的奏议已经送达通政使（正三品）负责的办公处所^②。这些公文迅速移交到承天门的宫殿，由大约十名的司礼监太监作初步的筛选。在那里，太监用不同色彩将卷宗作标记，把六部、军事机构与藩王府的公文分开。随后，他们决定是否立即把公文发送给司礼监掌印太监，或者，透过正式途径把它们转给内阁，最后由内阁转回到永乐那边作最后的定夺^③。

把个人注意力放在这类奏议上，的确增加永乐每天的差事负担。那就是为什么他需要翰林院学士的秘书性协助的原因。他所依赖的这些有学术资质的人和熟练的管理人员，发展成了内阁。他最初的七位内阁大学士里头，解缙（1369—1415）与胡广（1370—1418）这两位已经过世了，胡俨（1361—1443）改任国子监祭酒，而黄淮（1367—1449）正入狱服刑中。因此，能协助永乐在国家公文上作权衡、起草诏令与教谕的内阁大学士，只剩下有才气但又重实效的杨荣（1371—1440）、圆滑的金幼孜（1368—1431），以及几个月前才从监狱释放出来、正直坦率的杨士奇（1365—1444）。午朝结束时，永乐照惯例示意他们该立即工作，标出需要皇帝“批红”的那些奏章。永乐随后直接走向东安门，不到三年前，也就是1420年，他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叫做东厂的秘密警察机构，目的在于压制他的政敌，平息恶意中伤的谣言，还有搜集有关大明帝国情况的情报。

① 王世贞，《中官考》，《弇山堂别集》，卷90，页3975—3977（南京，1591；影印本，台北，1964）。

② 以十天为周期作代表，洪武和永乐皇帝处理了一千一百六十件奏议，以及大约三千两百九十件个别的事情（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页79）。

③ 与一般看法相反，永乐在1402年篡夺皇位时，有可观数量的太监已经能读能写（周龙，《明代之宦官》，页41、103）。